

中菲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

戚志芬

一

菲律宾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之国，北隔巴士海峡与我国台湾省相望，距离仅六十七浬。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中国和菲律宾自古以来关系颇为密切。两国关系究竟始于何时？中外有关学者历来众说纷纭。依文字记载，也有始于周、始于汉、始于公元三世纪等几种推测，尚待进一步探讨。不过根据信史记载和考古证明，两国关系至少可追溯到唐、宋，这在《新唐书》、《文献通考》、《宋史·外国传》、《诸蕃志》、《宋会要辑稿》等书中都有具体记载。唐、宋至元，中菲关系基本上限于贸易方面。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具体记载了中国商人到菲律宾的麻逸、三屿等古国，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的情况。《诸蕃志》记载：当时中国“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与当地入交易“土产黄蜡、吉贝、真珠、瑇瑁、药槟榔、于达布”等物^①。《岛夷志略》也称：麻逸与中国商船交易，“货用铜鼎、铁块、五采红布、红绢、牙铎之属。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守信，始终不爽约。”当时博易的土货有“木棉、黄蜡、玳瑁、槟榔、花布”等^②。

麻逸国即今菲律宾的东民都洛省，麻逸人就是岛上的少数民族芒扬人。近年岛上挖掘出来的大批唐、宋、明代的陶瓷器皿，以及从当地用瓷罐盛装骨灰等习俗来看，说明了该地曾受到了中

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影响。至今，民都洛岛卡拉潘市为纪念唐代商人首次登陆同麻逸国土著歃血为盟，通商贸易，交流文化，而于每年五月都要举行为期一周的“血盟节”，重演歃血结盟的场面，以缅怀这段历史。

宋元两代，菲岛以麻逸、三屿、蒲哩噜三国著名。到元末明初，这些古国名字在我国史书中逐渐消失，明初麻逸、三屿与中国贸易已为吕宋所取代。

明代的中菲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西洋考》中称：吕宋“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③。《明史》亦云：“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④。《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置福州。而比岁人民，往往入番商贩，由是吕宋诸番以时萃焉”^⑤。除吕宋之外，苏禄、猫里务、蜂牙施兰、沙瑶、呐哔啖等地，都有中国商人踪迹。当时流行一句话“若要富，须往猫里务”。到明后期，中国商人赴菲贸易几乎遍及整个菲律宾群岛。

明代中菲关系，由贸易进而发展到政治上的友好往来。根据《明太宗实录》、《明史》、《东西洋考》、《明会典》等书记载，明初至少曾四次遣使访问菲律宾各古国，其中包括吕宋、古麻刺朗（今棉兰老岛）、苏禄等。据《明实录》和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均有郑和下西洋时曾三次派遣分舩访问仁牙因、马尼拉、民都洛和苏禄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洪武、永乐年间吕宋、合猫里、蜂牙施兰、苏禄、古麻刺朗等菲岛古国，曾先后十五次派遣使节来中国通好。有的由国王或首领亲率使团来访，如蜂牙施兰国王嘉马银连续三次访问中国。特别是永乐十五年（1417）七月，苏禄使团由东、西、峒三王率领家眷并随众三百四十余人访问中国，受到明廷“视满刺加国王”一样的隆重国宾礼遇，在北京逗留了二十七天才归。归途中，东王巴都葛叭啉刺病逝于德州。永乐帝下令以王礼厚葬，遣官致祭；还亲自为文，树碑墓

道。并规定春秋二祭。除其长子回国继承王位外，王妃及余二子并随从等十人留下守墓。后两位王子也歿于中国。他们的后裔一直定居德州北营村及附近村庄，至今分别为温、安二姓，人口已达数百人，为中菲友好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政治上的互访，其实也是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朱元璋说过：“虽云修贡，实则慕利”。当时所谓“东洋针路”，在沟通和促进中菲两国的贸易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年约有三十三到四十条船，从马尼拉开往中国。当时从中国输入菲律宾的商品有铁器、火药、瓷器、绸缎、铜锣、五彩红布、甚至耕畜、耕具等。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商品有黄蜡、珍珠、玳瑁、黄金、棉花、椰子等。其中棉花大量输入，制成棉布后，又销往菲律宾，大大促进了中国当时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

十六世纪西班牙入侵菲律宾，虽然中菲两国传统友好政治关系中断（苏禄国除外，苏禄直到1729和1744年还遣使访问中国），但经济和文化交流一直延续。西班牙垄断了菲律宾的对外贸易。1573到1815年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贸易，实际上是以对华贸易为基础的。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曾称大帆船贸易为“中国——西班牙——美洲贸易”。西班牙殖民者让中国商船到马尼拉（每年约有二十到六十艘），用墨西哥银元买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等商品，然后把中国商品和一些其它亚洲国家的商品，用西班牙大帆船转运到墨西哥获取巨额利润。在大帆船贸易中，菲律宾是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继站，有利于西班牙，也有利于中国、菲律宾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拉丁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如番薯、烟草、玉米、菠萝、南瓜等，经由菲律宾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农作物品种。西班牙在墨西哥铸造的银元（俗称吕宋银、佛银）通过菲大量流入中国，在江、浙、闽、广、台、皖等省广泛流通，促进了中国货币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中国人移居菲律宾和华侨在菲广泛的经济活

动。

历史上中菲文化交流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华侨商人、工匠和农民，特别是十六世纪末以后形成的以马尼拉巴连市场为中心的华侨社会。

中国人到菲律宾定居可能早在唐代，但大批移居则在明代，尤其是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后。有明一代，厉行海禁，实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明中叶以后，私人海外贸易兴盛。隆庆废除海禁后，中国私人贸易海上者主要是前往菲律宾等南洋的东部地区，即所谓东洋。据统计，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从万历十一年（1583）以后，一般都在二十只以上，而且往往超过三十只；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左右，有时达到五十只^⑥。另一方面，因为当时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和商业比较繁荣，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都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方便条件。而东南沿海，人稠地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和赋税盘剥，使得生活无着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将出海当做他们的一种求生的手段。所以随着贸易发展，先后不少人为生活所迫移居了菲律宾。据记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即有十八只帆船运华侨五千五百人赴菲律宾，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有二十五只帆船抵菲运华侨六千五百三十三人^⑦。他们中除贸易者和零售商外，包括农民、渔民、各行手工业（金属、油漆、泥水、雕刻等工）的能工巧匠，也有医生、药剂师等。《东西洋考》吕宋条记载：“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洞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

同时，西班牙人初占菲律宾，因经济空虚，甚至西人的军械和食粮都要依靠生理人（Sangley）供应（西人初期称华侨为Sangley）。而且菲岛人口稀少，据估计1521年全菲岛人口只有五十万人。为补充人力缺乏，故鼓励华侨及各色人等入境。初期自由杂居，不受限制。后经林凤事件，为控制华侨，西班牙殖民

者于1582年规定华侨居住在润内（Parian，亦译巴连或巴利昂，意为市场）。在这里聚居了中国商人、渔民、菜农，以及织工、烧砖工、木工、铁匠、裁缝、修鞋匠、面包师、糖果商、药剂师、画匠、书匠等各行各业工匠。巴连每日供应鸡、鸭、猪肉、蛋类、蔬菜等各种中国食品和水果，并各种稀奇货物。其中部分商品，是在巴连由各行工匠就地制造，价廉物美。因此，巴连不仅是主要活动中心的华侨社会，而且也是当时马尼拉的工商业区，中菲两国人民文化科技交流的中心。

由华侨传播的生产和科技方法是多方面的：农业技术方面不仅有蔬菜和果类，而且向菲人介绍使用水牛、黄牛、马、中国犁耙、铲、镰刀等耕种工具，以及种植、捕鱼、养鱼等方法。手工生产技术方面，传授制糖、酿酒、采矿、炼铁、冶金、木器制造、雕刻、烧制砖瓦、以及建筑房屋等方法。其它如戏剧、音乐以及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亦都可探寻出中菲文化交流的轨迹。

二

印刷术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华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菲律宾并非偶然。去菲的华人中由于地理关系，闽人居多。福建的雕板印书自唐代以来，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安史之乱后，受中原文化影响，雕板业兴起，加以雕板所需的木材和造纸印书的竹材，都是福建特产。因而“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宋代福建刻印的书籍，“几遍天下”。到了明代，全国刊行的书籍，“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福建人去菲传播印刷术，是很自然的事。但由于保留下来的早期书籍资料有限，所以对菲律宾早期印刷业资料了解不多。近几十年来，因陆续发现了一些早期印本，才略知梗概。

1982年菲律宾访华团赠北京图书馆一本外文书，名《Doctri-

na Christiana》(基督教义)的影印本。引人注目的是：副标题为“菲律宾印刷的第一本书，1593年于马尼拉”。此书为西班牙文和他加禄文合刊本。影印本的前言由菲律宾专门研究早期版本的学者基仁诺(Carlos Quirino)所写，文中叙述了菲岛早期印书三种在国外陆续发现的过程以及各国学者对印书时间的争议等情况。

1983年笔者赴菲访问，在菲律宾国家史迹研究会、国家图书馆和菲律宾文化传统促进会联合举办的“菲华历史文物展览”上，有幸亲见菲律宾早期刊印六种书籍的扉页和部分内容的复印件，这些印刷品都是华人工匠自1593年至1606年十三年间在菲刊印的，是华人工匠的辉煌业绩，也是中国印刷术传到菲律宾的历史见证。

现将六种书籍略加考证如下：

一、《Doctrina Christiana》(基督教义)，西班牙文和他加禄文本(北图1982年入藏其影印本)。此书扉页刊明是159³年由圣多明尼各派教会在马尼拉的圣加比里刊行的。全书38页，雕板印刷。本文是西班牙文，再译为他加禄文(菲律宾国语)，同时附刊当时尚通用的古他加禄文字，是西班牙文和两种他加禄文并刊的本子。此书1946年在巴黎发现，由美国富商罗森华德购得，做为罗森华德藏书赠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1947年影印公布时，由埃德温·沃尔夫对此书做一详细介绍，现亦存国会图书馆。此书扉页注明出版地点是圣加比里(按：华侨的巴连市场是1582年设立，一年后因大火焚毁，于是迁至圣加比里(S. Gabriel)，而当时西班牙多明尼各教会的神甫负责向华人传教，其教堂即在圣加比里，此书既在此印刷，当然是华人印刷工匠的精心之作无疑(另详下文)。该书于1947年影印公布后，立即取得在菲印刷的第一本书的地位。

二、《基督教义》的中文本。此书扉页为西班牙文，书名也

是《Doctrina Christiana》，但正文是中文，因此称它《基督教义》的中文本。它也是雕板印刷。原本藏于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菲律宾圣多马斯天主教大学案卷保管人贡沙里斯神甫在阅读中得知此情况，法汉学家伯希和曾去函询问，并于1948年到罗马去，获见此书，并曾在《通报》(Toung Pao)上著文加以介绍。据贡氏说：“该书为皮面装订，用中国棉纸印刷，书长195公厘，阔140公厘，厚5公厘。共印有字者61页，空白者1页。封面为西班牙文，照中国书的式样是在书的底面。每页共有垂直的汉字九行，每行宽约一英寸之八分之三。书中汉字的排列是自上而下，由右而左，这与西文的写法刚相反。书的装订每两页相连在一起，把中间折起来成为两面，在装线处尚未割断，这完全是中国旧时书籍的装订法”^⑧。

中文本虽与西、他文合刊本为同一书名，但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并非是后者的译本。书中的同一名词，前后译法也不同，因此一般学者认为这是多明尼各教会神甫们为便于传教而译出的仪礼和经文的汇编。所用中文，并非文言文，而是当时菲律宾华侨通用的闽南口语，这是由于向福建移民传教之故。

美国驻菲大使馆图书馆历史收藏室，现藏此中文本的影印本。影印本附有赫苏斯·加约和安东尼奥·多明格斯两位神甫为此书写的考证文章，并在每页附以西班牙文原文教义相对照。后者是香港多明尼各教派的一位对中国语言文字很有研究的教授，他认定中文本教义的翻译是根据闽南土音，而且是十六世纪末时的闽南音。

中文本教义的作者是谁？众说纷纭。据记载当时在巴连市场做华人传教工作的四位神甫，大都学习华语，也有通晓中国文字的。例如：胡安·科沃、多明戈·德·涅瓦、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还有胡安·马尔多纳多。贝纳维德斯1587年到菲，立即学习华语，不仅能讲中国话，而且能用中文写请愿书，1590年曾

到过中国。马尔多纳多懂很多闽南语词汇。据记载，科沃和贝纳维德斯，曾向菲总督请求获准印发天主教华文教义单页，分发给华侨。《基督教义》的中文本写作，可能就是这样汇编而成。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中文教义未署出版年份，因此学者纷纷对此加以考证。基仁诺撰文提出各种证据，说明中文本可能是1590年出版的；而剑桥大学的荷兰学者龙彼得，则认为此书不可能在十六世纪末出版，但亦应不迟于1607年。然而我们根据菲岛总督哥麦斯·庇列斯·达斯马列那斯在1593年6月20日由马尼拉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报告书中的一段话：“陛下：鉴于需用甚殷，曾呈准在菲印刷基督教义。兹已印刷完竣，谨附呈两书：一为此群岛中最好的他加禄土语本，另一为中文本，此后向此两国传道，当更为便利……”^⑨，可以认为此中文本当亦为1593年上半年出版。

更重要的是，中文本扉页上印着此书由华人工匠龚容(Keng yong)获准在巴连市场印刷的。西班牙王室1556年曾下令，凡在殖民地发售或印刷有关当地居民的著作，必须获当局的许可证。这本书扉页上的两行西班牙文字明确写明“马尼拉巴连华人龚容特准印行”。

以上两种《基督教义》所绘图案和西文的字迹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这两本书可能属一人或同一印刷所刻印。据多明格斯神甫考证，龚容是华侨，居住巴连市场内，后来受天主教洗礼，为菲岛印刷业的始祖。菲律宾历史学家赛德教授曾说：“1593年出版了两本书：都是有关基督教义，一为他加禄语，另一为中文。这两本书都是在马尼拉由一位中国教徒——他的教名是胡安·德·维拉(死于1603年)所刻印的。他是菲律宾第一个闻名的印工^⑩。”西班牙天主教神甫阿杜阿尔特在他1640年出版一本书中也谈到“岛上的第一个印工是在马尼拉天主教多明尼各派教会的一个中国教徒，名胡安·德·维拉(Juan de Vera)”。据此似可认为，龚

容与胡安·德·维拉即一人，龚容受洗礼后，教名为胡安·德·维拉，但尚待进一步印证。不过赛德教授的书是1939年出版，那时中文本《基督教义》尚未被发现，因此他不可能提到龚容，他所以讲胡安·德·维拉死于1603年，那是把胡安·德·维拉误为胡安·巴普蒂斯特·维拉了，后者当时为华侨首领，1603年因张嶷事件，遭西班牙殖民者杀害。

三、《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此书原本今藏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原书因年久破损，已无封面扉页，但第一页的中西文字和插图却为判定此书的作者、书名、出版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第一页的上半是插图，绘一天主教神甫向一华人展示经书，这很明显是刊印《实录》的目的。下半页是中文，共十行，每行十个字，页首印“新刻僧师噶嘑噠撰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章之一”，页末印“此当之作非敢专制乃旨命颁下和尚王国王始就民希蜡召良工刊著此版系西士乙千伍百九十三年仲春立”。

作者“僧师噶嘑噠”就是当时在马尼拉掌管华人教务的天主教多明尼各派神甫胡安·科沃（前已提过的Juan cobo）的闽南音译名。据记载，此人是西班牙天主教多明尼各派传教士，1587年到墨西哥，1588年5月到菲律宾。在马尼拉的巴连市场，专对华侨作传教工作。他学中文很成功，熟悉中国语言、文字和习惯。

《实录》全书九章61页，首三章讨论天主教理，余为介绍西方天文及科学知识。全书用颇为典雅的文言文写成，可见科沃中文造诣之深，当然也可能有华人为之润色。页末两行字很清楚，写明“此书经主教（和尚王）与总督（国王）批准在马尼拉（民希蜡）召良工刊著”良工无疑是华人印工，因科沃就是在巴连市场华人中间传教的。此书卷末上有作者短跋，大意是：余功未完，另有派遣，待来年再加详尽编撰。科沃于1592年奉命去日本，此书的雕板可能在他离菲之前就开始，在“西士乙千伍百九十三年仲春”付印出书。此书与前面所述的《基督教义》同为1593年出

版，但前者没有月份，而仲春指春季之中，应是阳历三月。那么这本书很可能是菲律宾雕板印刷的第一本书。原书为台湾大学方豪教授于195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发现。据方豪考证说：1929年马德里国家图书馆曾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之鉴定汉文书版本，不知为什么，伯希和竟误认此书为1693年刻本，因而未被重视。方豪于1952年发现后，立即报导，才引起注意。荷兰学者龙彼得和西班牙历史学家桑士都为此撰文并影印刊出。但《基督教义》西班牙文、他加禄文合刊本，早在1946年被发现，业已取得“1593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印行之第一本书”的地位了。

四、是1604年出版的《玫瑰教区规章》。全书八页，用拉丁文书写。唯一珍本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是多明尼各派教會的规章，是西班牙神甫卡斯特罗于1586年写成的，（卡斯特罗曾到过中国，想要建立教會进行传教，但未成。）于1604年在马尼拉的宾诺陀克（Binondoc）由一位华人天主教徒胡安·德·维拉排印出版。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该书为排字印刷的，所以它是至今发现的菲律宾排版印刷的第一本书；二是该书为前面提到过的胡安·德·维拉排印出版的。根据史料：胡安·德·维拉原是一个中国商人，到菲后，在马尼拉多明尼各教堂受洗礼，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懂得艺术，因此常常帮助教會做一些装饰教堂的工作，例如油漆、绘画等等。考虑到印刷经文、圣书可以更好地为宗教服务，他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成为群岛上第一个闻名的印刷工匠。据传他在西班牙神甫弗兰西斯科·布兰卡斯·德·圣·何塞的指导下，还制造了菲律宾第一台活字印刷机（1602年）。他放弃了经商，专门从事印刷圣文、经书来为宗教事业服务。临终遗言嘱托其兄弟继续发展印刷事业。其弟继承遗志，也成为一著名的印书商^⑩。

另据鲍克斯尔（C. R. Boxer）从欧洲史料（1500—1750年）汇编的有关晚明和清初时期的海外中国人笔记中，有一段记

载：“这是一个中国人，在菲律宾经营第一个印刷所。就工人而言，从1593年在宾诺陀克设立印刷所之后，这个事业始终是中国人的。大约过十五年后，才有菲律宾人参加。雷答那（W. E. Retana）记录了1593——1640年间八个中国印工的名字，可惜只是西班牙化的名字。中国印工所印的书，包括西班牙文、中文，与像他加禄语等本地文。多明尼各派僧侣在华侨社会中，很热心传教，但效果不大。不过以胡安·德·维拉为首的所有印工已经都是教徒了^②。”由此可知，中国人在菲律宾经营了第一个印刷所，地点是在宾诺陀克，印工的首领是胡安·德·维拉。再一次印证胡安·德·维拉是菲律宾印刷业的创业者。排印的这第一本书，就是在宾诺陀克由胡安·德·维拉排印的。经菲律宾学者们研究，认为此书是自铸铜字模排印出来的。公认这是菲律宾排字印刷史上的一大贡献。

五、《新刊僚氏正教便览》。此书扉页为西班牙文，系排印。正文是中文，全书258页，半页九行，行十五字，则为雕板印刷，多简体字。此书作者是前面提到过的多明戈·德·涅瓦。据记载：西班牙神甫涅瓦于1587年到菲，先学他加禄语，后转入中国教区，立即学习中国语文，也是当时中文造诣很深的一位多明尼各派传教士。据说他为了向华人传教，曾用中文写各种宣传教义，基督生平、认罪书等，并编写过为学习中文实用的中文文法、词汇、手册等。该书是用典雅的文言文写的，不过主要名词却是为基督教义通用的闽南词汇，如天主为“僚氏”，即西文Dios的音译。

扉页写明此书为华人书匠彼得罗·德·维拉（Pedro de Vera）在宾诺陀克居所印刷，时间是1606年。彼得罗·德·维拉估计就是胡安·德·维拉的兄弟，他继承了其兄遗志，致力于印刷事业。此书唯一珍本，藏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

六、《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此书荷兰莱顿汉学研究所藏。

有一个残本，而梵蒂冈的耶苏会档案室则藏有一个完整的本子。由扉页确定书名为《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印刷时间是1607年7月，作者是“山厨罗明教多麻氏”，即多明尼各教会的多麻氏·马约尔。这是一本葡萄牙文著作的中文译本。全书316页，有序文和目录。所用文字多与《基督教义》中文本同，但略有修改。如将闽南口语的“只”，换作“此”，“再活”改为“复生”等等。与前面谈过的第三种书《实录》一样，也是一本包括教义和科学知识的文集，并以动物的习性来推论教理。每页上半有动物插图，下半全为文字，木刻。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也是刻于宾诺陀克华人教徒彼得罗·德·维拉之家的。

从上述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年菲律宾刊印的六种书籍来看，毫无疑问是华侨从当时印刷业颇为发达的福建原籍，将雕板印书的先进技术带到菲律宾，继而建立印刷所，由教会给予执照刊印书籍，并进一步改进技术，制造活字印刷机，自铸字模排印刊行西书，他们确实是菲岛印刷事业的开创者，而龚容和德·维拉两兄弟当是菲岛开创印刷事业的先驱。尽管龚容与胡安·德·维拉是否为一人，以及他们原来的中国姓名、身世等问题至今尚未考出，但这丝毫无损于他们在菲律宾印刷史上的重要地位。

上述六种书，是华人在菲开创印刷事业的历史见证，时间最早是1593年。早在1593年以前，华人在菲是否已经开始印书了呢？据史料记载：沙拉萨主教1590年6月24日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书中说：“当我写此报告书时，我手中正有一本拉丁文的 Latin Version Nabaro，就是华人印刷装订的^③。”这分明是说早在1590年，比《基督教义》早三年，巴连市场已有华侨印刷工人能为西人承印和装订拉丁文书籍了。历史往往为新发现的资料所修正，我们且待继续发现吧！但无论如何，即使仅此六种书，也当之无愧地为中菲文化交流史谱写了灿烂篇章。

虽然，菲律宾早期印刷的书籍局限于宗教方面，但印刷术的

传入，必然对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文化交流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环，不但能促进彼此的进步，而且也加强了人民间友好往来。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正是中菲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注：

①《诸蕃志》麻逸国条

②《岛夷志略》麻逸条

③《东西洋考》卷5吕宋条

④《明史》卷323，吕宋条

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5卷福建杂课条

⑥王士鹤：《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载《地理集刊》第7号

⑦《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V. 6

⑧刘芝田：《中菲关系史》

⑨同⑦V. 9

⑩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转引赛德著：“Philippin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1939. p. 38

⑪同⑦V. 30

⑫转引自《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68—169页

⑬同⑦V. 7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

昔之章傳真教正傳

Chang-jing: 1866

新刊僧師高四安撰無極天主正教真傳普錄卷之二



大同先聖字若有曰性
之謂道神道之謂教性
無二教也教其有一所
我知此則天主何真一
之理性可之道同也教
同之何以生殊現乎子
世之人或於異端不問
正道不遵正教其習借
為尚者謂於扶邪之說
無取故之教是以淫於
佛

此書之作非欲專引萬古命頓下 和由三國三益民
實是食利者此服係 西主之千益百一十三子 志 卷二

San-jing: 1866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ñola y tagala, con
reglas por los Religiosos de las
ordenes Impresa con licencia, en
S. Ignacio de la orden de S. Domingo
En Manila. 1593.